

风雪夜归正逢时

我是刘心武

刘心武 著



祖父、父亲和我

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

美丽的藩篱

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

楸树花

隆福寺的回忆

羞涩

闲为仙人扫落花

姐弟读书乐

瓜菜代·小球藻

风雪夜归正逢时

走出贝勒府

我的平民朋友

五十自戒

关于《班主任》的回忆

1978年春，为爱情恢复位置

从1985年那一晚说起

那边多美呀！

抚摸北京

漓江出版社

风雪夜归正逢时

我是刘心武

刘心武 著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雪夜归正逢时/刘心武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407 - 5409 - 9

I. ①风… II. ①刘… III. ①刘心武-自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5997 号

丛书策划:郑纳新

责任编辑:张玉琴

装帧设计:李星星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55087201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 × 690mm 1/16

字数:200 千字 印张:17.5 插页:4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 - 2925659)

是的，这就是我

（自序）

估计愿意看这本书的，主要是两种人。

一种早就知道了我。多半是1978年前后，读了我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等作品后，就一路追踪阅读我那以后的作品，长篇小说《钟鼓楼》，纪实小说《5·19长镜头》……但是，进入上世纪最后十年，我的生活和写作都边缘化了，这些读者随着年龄增长，也都遇到了人生当中许多的关坎，没有那么多时间阅读文学作品，我后来又写了些什么，生活得怎么样，他们就不大清楚了。但是，2005年，我忽然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连续讲了23讲《揭秘〈红楼梦〉》，跟着又出了两本共36讲的书，引出了不亚于当年《班主任》那样的社会性轰动，有人甚至认为比那时候还更热闹，这些我的老友或兴奋，或惊讶，因此，他们或者就想了解：你是怎么走到这一步来的？

另一种是非常年轻的一代。我发表《班主任》，甚至因《钟鼓楼》获得茅盾文学奖，以及担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的时候，他们或者根本还没诞生，或者还是没上小学的幼童，他们上到中学，或者刚考进大学，他们对早已边缘化的我，完全不知道，或者只是模模糊糊有点印象，也是因为《揭秘〈红楼梦〉》，我才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到2011年年初推出《刘心武续红楼梦》，他们更就好奇，这人是谁呀？什么？以前写过《班主任》，还有《钟鼓楼》？哪儿能找到这些古董？他们开始有了对我揭秘的兴趣。

那么，这本书，就主要是奉献给这些读者的。

这还不是一本自传。我还没到七十岁，也许过了七十岁我会静下心来写一部“从头说起”的自传。但这本由许多篇不是一个时间段里写成的文章组成的书，确实又有自传性因素。

这也还不是一本回忆录。回忆录跟自传是两种文体。自传是把自己的

一生展现出来，回忆录可以不去完整地交代自己的生平，而把重点放在写出自己所经历的社会变迁、所见所闻，往往会较多地写到别人别事。那么，这本书却也具有一定的回忆录的因素。

我是怎么活过来的？我有什么比较重要的值得一说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总之，这就是我。我面对大家，有些羞涩，却也坦然。

我的命运一贯如此：还真有喜欢我的，总在关注、支持、鞭策我，这些人士对我的理解、谅解、指正、宽容、善意、爱护，是我生命赖以存活、前行的宝贵动力，我对他们总是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感激之情，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能跟他们更加亲近。也真有讨厌我的，以至讨厌到咬牙切齿的地步。这本书当然首先是奉献给喜欢我的人士。但如果有讨厌我的人士愿意翻翻，我会高兴，因为，我总觉得，讨厌我的人士里，其中有一些恐怕是对我还缺乏全面的了解，如果读了这些文字，能多少增进些对我的了解，减轻些因讨厌我而生发出的痛苦烦忧，那么，对我来说是得大福气，对他们来说岂不也有利身心健康？当然，无论如何还是要讨厌我的，总会存在，那么，我祝他们幸福，祝他们能在所喜欢的人士那里，去获得快乐。毕竟，人活着应该把更多的情感赋予喜欢，而不是讨厌，爱比恨，肯定更有利于我们自身生命的良性运转。

1996年团结出版社出过一本《我是刘心武》，200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在那基础上增加新资料编成一本《我是刘心武》，现在漓江出版社所出的，保留了前两种的精华，又补充了近两年篇幅不菲、内容茁实的新文章，更可以使读者产生亲切感，但愿读者们读后，不仅是知道了一个人，更可以从多少增添些对时代、社会、人生、命运、人性的感悟。



2011年10月8日

目 录

是的，这就是我（自序） | 1

我是个最平常不过的人 | 1

祖父、父亲和我 —— 挣不脱的生命链环 | 7

炸出一个我 | 13

父亲脊背上的痍子 | 19

能够善良 | 23

免费午餐 | 25

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 | 29

美丽的藩篱 | 41

神圣的沉静 | 44

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 | 46

楸树花 | 51

我的元记忆 | 54

童年：火的记忆 | 57

小颗颗 | 61

硬木棍 | 65

隆福寺的回忆 | 69

哄堂大笑中的启示 | 76

白石的乳汁 | 79

恐怖 | 83

羞涩 | 86

“鸡啄米” | 90

有《第四十一》吗？ | 97

从“豆腐块”开始 | 99

我给小哥当哑奴 | 102
闲为仙人扫落花 | 106
姐弟读书乐 | 108
瓜菜代·小球藻 | 111
风雪夜归正逢时 | 116
走出贝勒府 | 131
我的平民朋友 | 151
惜别老罗 | 156
五十自戒 | 160
我爱夜凝珠 | 163
关于《班主任》的回忆 | 166
讲那照片的故事 | 173
1978 年春：为爱情恢复位置 | 178
珍藏激动 | 181
何处在涌泉？ | 183
守候吉日 | 188
从 1985 年那一晚说起 | 201
永失我车 | 205
我的心理保健操 | 207
好一趟六合拳 | 209
那边多美呀！ | 218
抚摸北京 —— 刘心武与北京 | 230
红故事 | 249

我是个最平常不过的人

我 1942 年 6 月 4 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母亲生我前，已有三子一女，最小的女儿已经 8 岁。当时家庭生活困窘，母亲不想再添累赘，便遍求偏方，想在孕中把我打掉，但那些偏方统统不灵，最后还是只好把我生了下来。

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父亲出于爱国热情，给我取名“心武”。“心”是排行，“武”是要以武力驱逐日寇的意思。

后来母亲一度带我回到老家安岳县。我的祖籍是安岳县龙台场高石梯，那是一个极其偏僻的村落。我始终没有回到过那个村落，尽管后来我不止一次回过安岳县城，并且有一次还回到过龙台场。老家安岳县永远能在我心中唤起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我记得它的一家理发馆中，有着一面用四排二十四把蒲扇连缀而成的大扇子，用滑轮和绳索构成一种机关，理发师傅给顾客理发时，可以用脚踩得它上下扇风。也许如今它早已被电风扇取代了吧，但故乡的那种特殊情调，既已储留心中，却是任何新奇的东西都不能淡化的。

再后来我家定居重庆。我们住在南岸，隔江与重庆城区相望。推开我家房舍的窗户，长江永无止息地流淌着，对岸是密密麻麻的“吊脚楼”，纤夫那悲壮的号子声一起一落地飘来，缝缀着大补丁的灰帆时隐时现地浮过……晴天很少，雾气常来，到了晚上，对岸的万家灯火仿佛无数只一眨一眨的眼睛，使我感到无比神秘。

我便在那雾蒙蒙的山城度过了我耽于幻想的童年。

1950 年，我父亲被调往北京工作，我们全家随往。从此，我便一直生活在北京。

刚到北京，我是一个顽固的“小川佬”。因为错过了新学期的开始，住家附近只有一所私立小学愿意接收我当插班生。我插进去以后有很长一段时



那时候我和姐姐都还不存在,父母与大哥、二哥、小哥在宁波(1930年)

间坚持说四川话,其实我心里早就会说北京话了,可就是不好意思开口,弄得老师皱眉、同学取笑。我记得有一天同班一位同学不知为什么事同老师顶了嘴,那老师气恼之下,便把他从我们三年级教室拖拽到了二年级教室,当场宣布了他的降级。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强刺激。我在生活经历中第一次体验到了对不公正的事情的义愤。我忍不住对同座的同学说:“干吗?!”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场所说北京话。

那所私立学校从校长到教师概由一个家庭的成员充任,整个学校的气氛令人难以忍受。不等国家对它实行接收、改造,我的父母就让我转到了另一所公立学校。在那里我戴上了红领巾。我是一个平庸的学生,最令我难忘的业绩,是有一回学校举行讲故事比赛,我竟被推选为班上的参赛者之一。经过反复预习和试讲,我终于在众目睽睽下登上了赛台,但我刚站定便失去了原有的灵感与勇气,结结巴巴地支撑到故事的结尾,在同班同学责备的目光和啧啧中走下了赛台。从那回起我就明白,在人生的途程中,我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因为我太笨。

有一天下午,午睡后跑去上学,发现旁边的座位是空的,一直空到下午

放学时。后来老师告诉大家，我的同座中午跑到城外窑坑游泳，淹死了。老师严肃地发表着由此派生出的训诫，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我只想着那同学上午还活现于我眼前的声容笑貌。头天下午上课时，我还用指甲在他那黝黑的胳膊上划出过白道。可是他竟从此消失了。这是我头一回生动而具体地体验到死亡的含义。

后来我上了中学。我直到初中三年级才懂得用功。到了高中，我的成绩更好一些。可是我取得好成绩是不容易的。刚上高一，物理老师第一次提问我，我就答错了，而且错得很蠢，我把每1米等于3市尺记成每1米等于3.3市尺。物理老师自然给我记了一个2分。后来我比学习其他功课更加卖力地学习物理，但物理老师对我的印象很坏，他教了那么多年，连1米等于几市尺都记不清的学生似乎只碰上过我这么一个，这很伤他的自尊心。他再没有提问过我，但渐渐地他惊讶起来，因为在后来我每次的测验、期考都得的是5分。期末考试采用的是从苏联学来的抽签式面试。我抽到的题签是一道最难的力学题，又要讲出道理又要计算准确，我战战兢兢然而仔仔细细地完成了全部要求。物理老师瞪圆了眼睛望着我，他似乎是很不情愿地给我记下了一个5分。但最后的学期总评，他还是只给了我一个4分。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我并非聪慧之辈，我会在最简单的问题上失足，而为了挽回损失我往往要付出最大程度的努力。

当然，另一方面我又充满了幻想。我觉得从打破世界举重纪录到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导演，从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到发明出一种新型的建筑材料，在我来说都无妨一试。生活似乎为我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

但是高中毕业以后出现了我以前未曾料到的局面。在高考中我遇到了挫折。不是没有考取，而是考上了一所排列在所有招生院校最末一名的北京师范大学。

一位高中同学，原来是近于崇拜我的，不仅是因为我学习成绩比他好，更因为他知道我常在《北京晚报》上登出文章，并且高考期间广播电台所播出的一出儿童快板剧，便是由我改编的；可我竟同他一样只考取了北京师专，在到师专报到时我们遇上了，他毫不掩饰、淋漓尽致地当众倾泻了他对我的鄙夷——这个强刺激使我对人生有了更立体的看法。

可是我自己并不认为我一定得上北京大学。我从上师专起开始离开家独立生活。我渐渐觉得去当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也不错。我以优异的学习成绩

毕业于北京师专，被分配到北京第十三中学教语文。我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自然更明显地暴露出了我的种种缺点和弱点，但有一个优点似乎是谁都承认的——我安心教学工作，备课认真，讲授生动，学生们的反映总是不错。

我上学比同代人早，所以从师专毕业时我才19岁。我一到北京十三中就教初二的语文课，只比我的学生大4岁。现在他们当然都早已走向生活，有的现在还能遇上，他们对我执弟子礼，使我很尴尬——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同一代人。

从1961年夏天参加工作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正是我从19岁到24岁的青春岁月。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缺乏社会生活经验的、性格偏于内向的中学教师，但我觉得自己生活得问心无愧，而且精神上很充实。我读了不少书——不仅是文学书籍，也有不少哲学、历史、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我熟悉了不少人——不仅是学校的干部、教师和所教的学生，更吸引我的往往是学校扫地的工友和冬天来烧锅炉的临时工，以及那些处于北京社会生活最底层的学生家长——建筑工人、三轮车夫、电车售票员、小饭馆炸油饼的炊事员、处于并不重要的路口的交通民警……及至于以捡废纸、看守自行车为生的老头老太太。我从他们当中发现了许多令我惊愕的世态人心，更发现了强烈而持久的美。

那一阶段我的生活天地很小。学校就是那么大，平日能够延伸出去的生活领域也就是北京北城钟鼓楼、什刹海一带。中学教师几乎没有出差的机会，参加一次到天津兄弟学校的取经活动，对我来说便是生活当中的一桩大事。但就在那几年里，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的普通话说说得别人绝听不出四川口音，还能以极够味的北京土腔同学校里的工友对话。例如天气闷热时，便会说：“这天哪，盖了盖儿啦！老爷子烟高粱秆儿啊，邪乎！”语言还在其次，我觉得自己已能体会到“老北京”的种种特殊心境，我没有忘记祖籍安岳那些赭色的丘陵，没有忘记成都武侯祠的柏林，没有忘记嘉陵江畔的帆影，但我认为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北京人——直到今天我写小说，从构思到落笔都使用北京话便是明证。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袭来时，我在政治上还完全处于懵懂状态。解放后在此之前的历次政治活动，我因为年龄小都没赶上过。1957年“反右”时我刚上高中，只知道校长和几位主任以及十多位教师都被划成“右派”了，后来陆续不见踪影，但那时教师搞运动单在一间不让学生进去的大屋子里挂大字报、开批判会，所以我和同学们



1961 年到北京十三中任教，图为校门

照样悠游嬉戏，并不知道在那间大屋里出现了一些什么场面。我上师专时党内有过一次“反右倾”，但我连团员都不是，自然未受触及。参加工作以后，我才加入了共青团，但 1964 年以后搞“四清”运动，学校里虽然也抽了一些人去参加，我却一直留在教学岗位上教我的课。

“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气势一下子君临了我们那所小小的学校。我不可能是“革命造反派”，因为尽管我比那些“造反”的高中三年级“小将”大不了几岁，但已属天然应受冲击的教师群中的一员。我也不可能一开始就成为冲击对象，因为无论当“走资派”，还是当“反动权威”我都不够资格。我确确实实给吓坏了——因为几天之内，“造反”的“小将”就在校园里打死了好几个人，有他们认为“该死”的“臭流氓”，也有从校外拉来打死的“反动资本家”，学校的党员干部和一些老教师在武斗中被极其粗暴地践踏了人格。在那样一种狂热和恐怖交织的气氛中，我内心里既充斥着对理论的崇拜又充斥着对实践的怀疑，我的灵魂被煎熬得好苦。

后来冲击波渐渐逼近了我。我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一些“豆腐块”就刊登在邓拓的《燕山夜话》旁边。其中一篇文章认为京剧改革虽好但不宜取消小生等行当、水袖等技巧，再加上我在课堂上所讲的也被回忆出不少“放毒”的成分，于是乎出现了揭发我“反动言行”的长篇大字报。后来有一天，

“群众专政小组”便在校门内贴出了大幅告示，当天下午两点半于操场召开批斗我的全校大会，主要的罪名是“猖狂反对京剧革命”和恶毒攻击江青。

那天中午我照常到食堂吃了饭。胃口不大好，但也还吃得下去。回到宿舍，我躺在一把旧躺椅上，自己也感到吃惊——我何以这样镇静？我没有萌生自杀这类念头，只祈求挨斗时他们不至于把我打死或致残——所谓“群专小组”当时完全干得出这种事。后来我听见有人敲门，便本能地跳起来打开了门——门外是我教过的一个学生。

这件事至今回忆起来还令我战栗。那敲开我门的学生是一个曾使我倾注过大量同情的弱者。他的父亲运动一开始便被本单位“遣返回乡”，并且据说一抵达乡里就被打死了。他的母亲和我一样也是中学教师，因为丈夫的问题处境维艰。他本人则被同学们视为“狗崽子”，不仅无资格参加“造反”，有时还要受到诟骂。我曾在他母亲情绪最低落时，壮着胆子去他家看望过他母亲和他们三个兄弟，在“红五类”同学辱骂他时，给予过劝阻。但我万没想到那天中午是他来敲开了我的门，并且他脸上呈现出一种明白无误的恶意的好奇感，他那表情就像用文字书写出来一样，令我终生难忘——“啊，今天下午要斗你了，你中午待在这儿干吗呢？我可得喽戏喽戏（北京话‘看看热闹’意思）……”是我理解错了吗？不，原来他后面还有几个具有同样好奇心的“红五类”；他看来不像是被逼迫着来打头阵的，因为他的表情松弛而生动——我一开门他便望着我得意地假装咳嗽。

我使劲撞上门，倒在躺椅上。我遍体清凉。我这才懂得世上有超越我个人悲剧的更大更深的悲剧——心灵沉沦的悲剧。

后来那次批斗我的会戏剧性地延期了——仅仅是因为“中央首长”发表了一个什么新的重要讲话，必须倾校而出游行欢庆。而学校偏又进驻了新的“工宣队”，据说“工宣队”的区指挥部看了“群专组”上报的关于我的材料，认为我的“罪行”还不到“全校揪斗”的程度，我便被从轻发落——派到农村劳动去了。

后来我也算太平平地经历完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就我个人而言，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也没有多少值得特别惭愧的。我实在只是个最平常不过的人，所有的不过是些最平常不过的经历。

1996 年

祖父、父亲和我 ——挣不脱的生命链环

曾在四川成都出版的《晚霞》杂志（省委老干部局主办）上看到萧英老人写的《难忘的记忆》一文。此文回忆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共产党人和国民党里的反蒋反汪人士，以及一些观点与他们相合的其他政治团体的人士，还有无党派人士，从武汉、四川流亡到上海，寻求一个落脚点。他们在上海遇到了辛亥革命的老前辈刘云门先生（又名刘正雅，笔名镏鱼山）。刘先生是四川安岳人（杂志上误为广安），清末最后一科举人，留学日本时进过两所大学，在东京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大革命时期到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授，与共产党人毕磊等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任干事，北伐时以军医身份随军突进至武汉。在汪精卫宣布“分共”后逃至上海，著114句36韵长诗《哀江南》，痛诉“四一二”后的愤懑与悲怀。不仅抨击了蒋、汪，也对政治诡变中的各种屠夫、孱头、肖小，以及“卖人肉包子”的告密叛徒等鬼蜮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讥讽批判。气势磅礴，正义凛然，艺术上也相当成功。曾用“唯物社”名义自印散发，后又有“神州国光社”的印本面世。他在上海利用自己在国民革命中的威望，找到招商局督办赵铁桥（亦是老同盟会成员），于是赵把招商公学交给他，由他出任校长，以专门收容各路因不与蒋、汪合流而衣食无着的知识界人士。萧英老当时二十来岁，也被庇护于此。1929年萧英等自发组织了一个共产党招商公学支部，刘云门以党外人士身份参加支部活动。1930年赵铁桥被刺身亡，南京派来的新督办下令关闭招商公学。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寇轰炸上海，刘云门牺牲于日寇炮火中，他的书稿《人类命运论》，同日亦与被炸的商务印书馆一起焚于敌焰。

萧英老文章中写到的刘云门，便是我的祖父。

我在祖父罹难十年后方出生。虽然我父亲经常给我们子女讲述祖父的事迹，例如 20 世纪 20 年代祖父在北京时就专门收留四川来的各路暂时落魄或需隐蔽一时的豪杰，朱德在离国赴德前就住在我祖父家中，并且为了避人耳目，还干脆让朱德住进我父亲的卧室，等等。但我们都不大在意，尤其是我，祖父我见都没见过，他的荣辱功过，跟我有何大的关系呢？

后来我们子女更得知，祖父在世时，对父亲并不怎么满意，他们父子之间，有着许多心灵上的隔阂与感情上的冲突。父亲对祖父，是又爱又怨，又尊又怪的。

回想我的少年时代，和父亲很有几次非常严重的冲突，我毫不留情地说了毫无根据的故意惹他伤心败他声誉的话，气得他浑身发抖，竟一反常态地挥手打起我来。结果我拼力反抗，他的手竟被震麻弄痛。这几次冲突都被母亲细致地记入她的日记，和那些年月她的家庭油盐柴米账记在一起。

如今我的父母也都故去了。我只是在年过半百之后，才在比如说一个阴雨绵绵的傍晚，一个万籁俱静的清夜，忽然痛心疾首，忆及我竟那样毫无妥协余地地伤害过父亲，并把伤痕一直延伸到母亲的心上。

我不知道父亲对我发怒时究竟是怎么想的，他在暴怒时一定视我为“弑父弑君”的大逆不道之徒。其实，仔细想来，我并不是真要妨碍他的继续存在，我只不过是想换一种跟他有区别的活法罢了。

当我翻看着母亲那已成为遗物的日记时，我才发现，其实这世上为我付出感情最多而且最浓又最持久以至能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是我的父亲和母亲。那不止是亲子之爱，也不仅有“不成钢”之恨，还有许许多多超过语言文字表达限度的复杂因素。那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如今我憬悟，这是没有办法，而且用不着想办法，不该去想办法的事——我的身上，流着父亲传给我的血，当然，那也是我祖父通过他再传给我的。

我是祖父刘云门、父亲刘天演的一个天然遗传物。

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我经历了许多次有时是很激烈的代间冲突。因为政治，因为经济，因为道德观，因为兴趣爱好分流，因为认识分歧，因为感情波动，因为性格的变异，因为无端的烦躁，因为单向或双向的误解，以及什么也不因为……有时是被时代、社会的大潮流所推动，有时迫于具体处境，有时完全是主动出击，有时似乎非常清醒，有时实在是浑浑噩噩，有时始于理性而终于非理性……代间的冲突酿成了一出悲喜正闹的活剧。



我的根 20 世纪初在北京净土寺胡同

我不是宗教徒。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和我一样，没有宗教信仰。我们不觉得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在我们的肉体 and 灵魂之上，而我们都面对着他，因此要对他负责。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浸润，使大多数西方人觉得在人与人之间有一个上帝，因此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代间的差异冲突和个体生命与上帝的差异和冲突相比，因有质的不同，所以简直微不足道。人与人的关系是面对上帝的平行线。我们中国人，尤其汉族人，其绝大多数人，人与人之间是亲族的链环关系，一个人，只是这链中的一环。比如我，我没有上帝，我只能这样来确定我的位置：我是我祖父祖母的孙子、父母的儿子、妻子的丈夫、儿子的父亲，以及谁谁谁的朋友、谁谁谁的对头、谁谁谁的邻居，等等。我需对以上种种人际关系负责。现在我非常理解孔夫子提出的“仁”，这个字拆开了就是“二人”。是的，儒家学说的精髓就是让我们时刻意识到，我们



1956 年与父亲刘天演在颐和园



1956 年的母亲王永桃

没有单独的个人价值，我们个人的价值是建筑在起码两个人以上的关系上的。而在我们所置身的人际链环中，最重要的是：我们是谁的后代？我们是否令他们满意？

我不知道祖父如果看得到今日的我，他会有何观感。父亲没有等到我大踏步走入文坛，就过世了，他其实并不一定希望我成为一个作家。想起来常常发愣，为什么父子间的冲突，即使在最亲和的家庭中，也往往不能避免？

《红楼梦》里写到的贾政和贾宝玉的冲突，常被论家定性为封建与反封建的冲突。这诚然是一种很有道理的辨析，但其实贾宝玉何尝有“弑父弑君”之想？他自己又何尝有明确的“反封建”理性？近年已有论家著文，说贾宝玉是个浪漫诗人，他要生活在诗境里，所以不断和现实发生矛盾。他的与蒋玉菡交厚，与金钏儿调情，都并非是针对君、父的，他那“下流痴病”纵使发展到极端，也不至于去参加农民起义军，掀翻王朝和贵族府第。他的“不肖”，在偶然事态的引发下，使得贾政恨不能把他“一发勒死了，以绝将来